我的治学经验

——在学术活动7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张友渔

今天，承大家为我举行很隆重的学术活动七十周年纪念会，我感到荣幸，衷心感谢！同时，也很惭愧。因为我不是象大家所称赞的名符其实的“学问家”，大家对我有些过奖，有些溢美之辞。实际上，我是做了一些学术活动的，但作为一个真正的“学问家”，我不够格，我可以说是一个政治活动家或者政论家兼做了一些学术活动，不敢接受大家所给戴的这顶大帽子。另一方面，我国正处在前进中遭遇到困难的时候，人们都苦心焦虑地为进一步有效地进行深化改革，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而努力。在这个时候，大家费了很多时间、很多精力来给我搞个纪念会，我自己深感不安。

我的学术活动如果说还有可取之处的话，主要是这么一点，就是古人所说的“学以致用”。我从幼年时候起就有这个思想。这是因为那个时候，政治腐败，外国侵凌，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秋，知识分子关心时事，都要用所学的东西“治国安邦”、“救亡图存”。“学以致用”，也就是现在说的“理论联系实际”。我受当时客观实际的影响，也有“学以致用”这个思想。学是为了要用，要用学来的学问解决实际问题。这是时代的要求。但是学什么？怎么用？是走了弯路的。开始是要用儒家的“仁政”、“礼治”的学说来救国。后曾受康梁维新派改良主义思想影响，特别是对梁启超的论著很崇拜。“五四运动”前后，转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加入国民党，同时，也研究各派社会主义学说，最后才找到了马列主义，加入共产党，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一直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的思想和实践有个逐渐发展的过程。但是不管怎样，总之是“学以致用”。不是为学问而学习，而是为解决问题而学。假使说，我的治学经验还有可取之处的话，主要是这一点。正由于这样，我不是一个含义确切的“学问家”。我写的东西近千万字，但是大都是论文或小册子，或者是论文集，真正有系统的、学术性的专著很少。就这一点说，做为“学问家”是不够格的。这是第一点。

再一点，我是喜欢读书的。说得好听一些是“博览群书”。从幼年开始就有这个习惯。大概因为我是出身于一个穷秀才的家庭，我父亲就是喜欢读书的。所以，从儒家的经典著作，到诸子百家，历史、地理著作一直到小说，无所不读。特别喜欢读的是包罗广泛知识的“类书”，例如，《太平御览》、《广事类赋》等。关于小说，不论章回小说、笔记小说、歌曲、弹词，我是无所不读的。当时的小说差不多都读过了。当然，那时的小说不很多，不象现在这样汗牛充栋。因此，我曾被人们叫为“小说家”。这个“小说家”不是写小说的“小说家”，而是看小说看得多的“小说家”。由于喜欢读书，也就喜欢藏书、买书、借书以至抄书。那时，我家里藏书不少。我还经常买书，买不到的书，向别人借，认为好的、有用的就整本抄下来。今天会上陈列的书里有一本毛奇龄著几万字的《回书改错》，就是我用蝇头

小楷抄写在毛头纸上的本子。由于读书杂、接触面广，不受一家一派的思想言论的拘束，并受斗争生活的影响，所以思想比较解放，好写翻案文章。但都是经过考虑，不是标新立异，为翻案而翻案。因为读书多，所以买书也多，买书就成了习惯。过去在北京隆福寺、东安市场、西单市场等地的旧书店，有机会就去逛，琉璃厂更不待说了。在日本东京也是每晚到神堡町夜市买旧书。到哪里都买书，结果丢书也丢得多，每在一个地方呆不住，离开时书就丢了。法学所的同志们知道，“文化大革命”中，我的书除交给所里的如《四部丛刊》、《九通》、《二十五史》以及一些珍本外，我留下来经常备用的现在还有两、三万册，专有两间房子存放着。这个习惯也可能是有可取之处的。但是，老实说，这么多书并不能都精读，有的只是浏览一通略知梗概，有必要时再去查阅。我读书多，但反对“记诵之学”，重思考，不重记忆。主要是理解书的精神实质，掌握书的主要内容，不求强记，死记书的辞句，并且是用思考来帮助记忆。举一个小的实例，我幼年在私塾读书时，老师讲过的书，要学生“回讲”。有的同学死记老师讲的原话“回讲”，结果常是丢三落四，说不清楚。我不是死记原话，而是理解它的意思，反而在“回讲”中说得有条不紊，表达准确。现在，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也只记基本的、重要的、必须记住的，其他只记大意和出处，用时查阅。日前有些学校，训练班等，考试学生所出的题是要学生照抄课本原话，这是不足取的。在我们普法教育中也有这种缺点。

第三点，我研究学问，发表论著总是从实际出发，很少泛泛而论。所谓实际，包括两方面，一是当前的实际即客观存在的事实；另一是过去的实际即准确的文字资料。解决理论问题也好，实际问题也好，首先要从现在的实际出发，也需要依据过去的实际即文字资料。一定要有丰富的、全面的、准确的资料。过去我在北京教书、办报的时候，没有现代化设备，资料来源除书刊外，主要依靠自己剪报和搞卡片，现在我还保存着这种手工业作风。资料一定要核实，不能是片面性的东西，必须比较各种不同的资料加以核实，不能轻易相信一方面的资料。我从少年时期就受“汉学家”的启发，重视考据，这个工作是很下了功夫的。我有时有这样的偏见，宁愿相信野史，不相信正史。正史总是统治阶级“钦定”的，野史是个人写的，虽然难免也有个人偏见，但比“钦定”可能符合事实。这也许是我的偏见，不一定对。这是关于资料问题。

关于当前的实际即客观存在的事实，要准确了解它，当然需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我觉得调查研究一定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这样才能得到真实的情况。这也是我的亲身体验。我在北京当穷学生时，经常接触群众，所了解的社会情况是和表面现象不一样的。我在日本留学时住在一个工人家里，并经常到贫民窟去(现在说日本怎么怎么好，我估计也还有阴暗面)，并且东南西北一个人到处跑，北海道、九州、四国、大阪、横滨等地都去过了，亲身到群众里头，到实际生活里头去体验，了解得到的情况也和表面现象不同。我们强调调查研究，这很好，但所采取的调查研究的办法，不一定能得到真实的、准确的情况。最好是能够下去蹲点，体验生活。开座谈会也要找各种不同意见的人，不可偏听偏信，不可只听一面之辞。现在调查研究是不是有这种现象，听听准备好的汇报，看看准备好的文件，看看准备好的典型，就认为是真的。说句极端的话，这样的办法比不调查研究还坏。因为，不调查研究，从主观主义出发，作出决策有时也可能碰对了。经过所谓“调查研究”把不真实、不正确的东西当为真实的、正确的东西，依据它来下结论、来决策，一定是错误的。这就是说一定要从当前的实际出发。当然，说从当前的实际出发是不是就没有前进方向，完全不考虑将来的事情呢？不

是。大家现在不是提倡要“超前”吗？从实际出发就包括最近的将来这一段时期。这段时期需要做的、可能做到的事情，也是当前的实际所包括的。从实际出发不是只看到眼前，不看到将来的前途，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考虑全局。但是也不能脱离了实际去空想。什么叫“超前”？不能超得太远了，跨的步子太大了。总之，从实际出发不只是根据当前存在的事实，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也要有个预见性，考虑到最近的将来。

第四点，象大家讲到的，我也确实这样做了。我发表言论、写东西，都是讲自己的话，不抄袭、不盲从，反对教条主义，也不迎合时尚。决不大家都这么说，或者哪个有权威的人说了，我就跟着说。经过我自己考虑了、研究了，认为是对的，我才说。就对待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来说，当然要发展，不可以僵化，更不可以照抄，我主编《政法研究》时，曾说过：整段整段地照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不给稿费。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戴上反对马列主义的帽子。但对马列主义也不能曲解，不能臆造，不能抽梁换柱，变相否定。目前在学术界两个毛病都有。我是这么考虑：僵化思想是现在的主要毛病，要纠正。但也有否定马列主义，曲解马列主义、冒充马列主义、把不是马列主义的东西也说成是马列主义的发展的苗头。这需要防止泛滥，当然主要是克服僵化思想，教条主义。

第五点，我著书立说都是手工业作风，一切亲自动手，很少请人提刀代笔。当然，现在因事情多，工作忙，对一些应付门市的东西，有时也得请人帮忙，查资料、拟草稿，但我事先一定要把我的立意布局给他交待清楚，事后一定要审阅修改，有时改得面目全非。亲自动手这个作风我认为是好作风，应该坚持。自己说的话应该自己讲嘛，特别是讲话稿或提纲应该自己写出来嘛，不能让别人替你说话。对别人代写的东西，不但在内容方面，而且在文字方面也都要字斟句酌，认真审阅。甚至标点符号也都注意。要养成这么一个习惯作风。

以上是讲我的所谓学术活动，有这么几点自己的经验。

最后一点。总的来说，我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评价问题、处理问题，都力求运用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的方法，现在特别经常强调历史唯物论。因为一切事物总是不断变化的，不能拿一个标准来衡量一切时代，一切地方的一切事物。昨天是对的，也许今天就不对了；今天对了，也许明天就不对了。认识、分析、评价、处理问题都要根据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一个问题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所以我是强调这点的。在少年时代我不懂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但是，已从儒家的书里，特别是道家的书里学到一些朴素的或者说是唯心论的辩证法和历史观。我很欣赏的就是《孟子》一书中所载的一段故事：孟轲见齐王后，离开齐国，齐王送他兼金一百，他不接受。后来他到了宋国、薛国，离开时，两国送他路费，他都接受了。他的弟子陈臻问他：何以前者不受，后者受，岂不前后矛盾？“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则前日之不受非也”。孟轲的答复是：“皆是也。”① 因为情况不同，“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处理问题不能一刀切，在不违反原则的条件下，要具体问题具体解决。现在我们进行改革，除旧布新，但不能把过去的一切一笔抹煞。同样，今天改革的成果，也许明天又需要改革，不是一成不变的。我是这个观点。

总之，我不是所谓“学问家”，我的治学经验如果说还有可取之处的话，那就是上面所说的这几点。

（作者单位：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责任编辑：林　炎

① 《孟子·公孙丑章句下》